



三棱镜下的俄罗斯电视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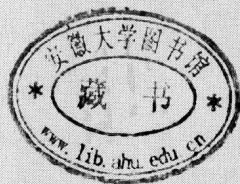
李静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长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基金资助

三棱镜下的俄罗斯电视传播

李静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棱镜下的俄罗斯电视传播/李静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106 - 03487 - 0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电视—传播媒介—研究—俄罗斯 IV. ①G2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9935 号

责任编辑: 类成云
封面设计: 刘 阳
版式设计: 李天天
责任校对: 杜 悦
责任印制: 张玉民

三棱镜下的俄罗斯电视传播

李静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2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487 - 0/G · 0718
定 价 36.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王玉东先生，

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引领、鼓励、陪伴和爱。

目 录

Content

绪 论	1
第一章 突发事件与危机报道平衡互动因素的提出	15
第一节 突发事件与危机报道核心要素分析	15
第二节 突发事件与危机报道平衡互动因素研究范式	25
第二章 危机报道与媒体策略	33
第一节 俄罗斯三次危机事件报道中媒体策略分析	33
第二节 俄罗斯三种传媒体制下的危机传播效果分析	59
第三章 危机报道与政府策略	85
第一节 俄罗斯三种政权模式下危机观念与政府策略的符号置换	85
第二节 俄罗斯三种政权模式政府形象识别 (GIS) 程序	106
第四章 危机报道与受众策略	133
第一节 传播受众理论概述	134
第二节 俄罗斯三种政权模式下危机报道与传媒受众	136
第三节 俄罗斯独特受众形成的原因探索	152
第五章 俄罗斯突发事件应对策略的启示	163
第一节 危机报道原则的不可违背性	163

第二节	应急保障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166
第三节	建立健全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170
第四节	抵制来自西方利用危机报道对国内的干预和渗透	174
第五节	重大危机事件媒体与政府充分合作	176
第六节	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普及和完善	181
参考文献		193
后 记		203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转型期中，俄罗斯危机事件层出不穷。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1994 年车臣战争、2004 年别斯兰人质事等系列事故中，俄罗斯应对不同的危机事件，在体制的制约、传媒的影响和受众的群体心理的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应对措施一波三折，形成三种不同外延的策略体系。对俄罗斯的研究可以对我国的有关突发事件应对的研究起到借鉴和帮助作用。

二、研究文献综述

本书文献研究综述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国外有关学者（俄罗斯学界）对俄罗斯本国大众传媒状况的研究。第二是国内外学者对危机事件或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研究。

（一）国内外有关学者（特别是俄罗斯传媒界）对俄罗斯本国电视业状况的研究成果

1. 俄罗斯当代传媒界的奠基人、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前系主任雅·扎苏尔斯的思想代表了俄罗斯新闻学界的最高峰。有关俄罗斯大众传媒的书以其两本书为代表。一本是《俄罗斯大众传媒系统》（莫斯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Я. Н. Засурский. Система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1），另一本是《自由的诱惑——1990 - 2007 年俄罗斯新闻》（莫斯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在这

本书中“收集了发表于1990年到2007年有关大众传媒的文章，这些文章详细地展示出作为年轻的俄罗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切合点的传媒发展的各种解决方案”^①。本文的写作受到了以上这两部书的指导和启发。

除了雅·扎苏尔斯基，还有一位教授В. Л. 茨维克 (В. Л. Цвек) 是广播电视方向的权威，其代表作有两部。一部是《电视新闻》(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部是《电视的新闻服务》(莫斯科尤尼基-塔纳出版社2008年版，В. Л. Цвек Телевизионная служба новостей ЮНИТИ Москва. 2008.)。这两部书主要阐述俄罗斯广播电视史(包括苏联部分)、俄罗斯广播电视的机构设置、俄罗斯广播电视业务水平和学术流派的研究现状，学术价值很高。本文有关俄罗斯电视方面的资料大多引自В. Л. 茨维克 (В. Л. Цвек) 教授的著作。

2. 其他有关广播电视的相关书籍

(1) А. Г. 卡切卡耶娃：《电视与广播的天空——历史与现实》，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电视教研室论文集，莫斯科出版社2008年版。

(2) С. Н. 伊利切克：《国内电视业历史、困境与前景》，文献汇编，圣彼得堡出版社2008年版。

(3) Д. Н. 普林：《巨大的抉择——俄罗斯政治思想大事记2006-2008》圣彼得堡：阿烈杰亚出版社2008年版。

(4) М. В. 史科吉娜：《大众传媒的难题——信息的议事日程》，论文集，莫斯科观点出版社2008年版。

(5) 普罗霍洛夫 Е. П.：《新闻理论的前沿》，莫斯科出版社1995年版。

(6) П. А. 茨冈科夫：《国际关系》，莫斯科新学校出版社1996年版。

3. 笔者受到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的启发，这些文献包括对俄罗斯传媒作高屋建瓴地宏观把握的论述：胡太春的《从古辛斯基的沉浮看俄罗斯传媒政策的走向》、《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传媒》；程曼丽的《“松”与“紧”的变奏——现行俄罗斯新闻体制的演变及特点》；李兆丰的《转轨模式的选择与俄

^① Я. Н. Засурский. Испытание свободой - Российск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1990 - 2007.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 2007. с. 1.

罗斯传媒发展》；陈慧颖的《全球化条件下转轨与传媒互动机理研究》；李玮的《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吴泽霖的《苏联解体后俄国报刊业的发展态势》；聂长云的《俄罗斯新闻业在过渡时期痛苦求索》等。对当代俄罗斯宣传模式进行分析的文章：洪沫的《当代俄罗斯传媒的政治宣传模式评析》。对媒体与政权之间关系表述的文章：胡逢瑛的《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角色》；吴非的《俄罗斯媒体资本运作与国有公共服务制的建立》。对大众传媒法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于洪君的《俄罗斯联邦调节大众传媒的法律规定》，以及外国新闻史专著中有关俄罗斯传媒的部分。

（二）国内外学者对危机事件或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研究

1. 突发事件或社会突发事件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庄子·则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韩非子·喻老》）、“富贵必履危机”（《晋书·诸葛长民传》）等道理作出总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欧阳修·《伶官传序》），一直以来都作为中国国君治国理政的基本准则。现代危机管理起源于急诊医学，并逐渐应用于战争学研究、企业管理研究和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领域。

2. 危机公关属于公共关系学。公共关系学最早被称作“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开始于美国，英国则被称之为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在中国多被称为国际交流（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公共外交在现代外交政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缘其被视为一种在国外培植信任和理解的有效工具，美欧国家最先注意到公共外交的作用，并组建了相关机构加以实施。美国“9·11”事件之后，社会突发事件成为世界范围内炙手可热的话题，迅速形成一股强劲的危机管理“研究热”，并很快形成了“暴力恐怖”、AIDS、重大自然灾害等几个热点问题，公共外交的巨大价值引起各国广泛的关注，研究重点逐渐集中到通过这种方式为国家形象和外交活动服务的轨道上。

近年来，研究我国社会突发事件管理的成果越来越多。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针对社会不平等、不公平、不稳定及其他社会危机，明确提出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重心消弭社会危机的战略构想；薛澜、张强、钟开斌

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 2003 年版），通过大量案例分析，探讨了转型期我国社会公共危机形态的根源及特征。

3. 由于危机事件层出不穷，有关危机传播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大部分集中在对外传播理论和技巧方面。赵立志所著《危机传播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版）从研究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的基本原理入手，探讨危机传播的模式和机制，分析危机事件中的新闻报道应掌握的原则、方法和策略。蔡国芬、徐琴媛主编的论文集《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广出版社 2003 年版），论题涉及国际新闻的方方面面和跨文化传播这个全新的学术领域。杨伟芬著《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就某些典型事例作为个案研究来论述广播电视即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赵雪波著《看得见的手——国际事件中的传媒》（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提供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诸如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克林顿性丑闻、美军亵渎《古兰经》事件等国际事件作为研究范例，突出了现代传媒的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作用。

三、研究理论、视角及方法

（一）美国学者 G·格伯纳为代表的“培养”理论及其外延研究

1. 传播效果理论的发展脉络

在对培养理论进行阐述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对传播学中传播效果理论进行梳理，因为效果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信源、信道、信息、信宿、效果）之一，而其他四个领域的研究，其终极目的也都是为了提高传播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效果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是重中之重。培养理论是传播效果理论的一个分支。

从 20 世纪初到现在，传播效果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

（1）早期的“子弹论”或“皮下注射论”。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末是

^① 根据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有关内容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3 - 200 页。

传播效果研究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的核心观点是：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称为“子弹论”、“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施拉姆曾经对它做过如下概述：“传播被视为魔弹，它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传播似乎可以把某些东西注入人的头脑，就像电流使电灯发出光亮一样直截了当。”^①

(2) “传播流”^② 研究与“有限效果”^③ 理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对传播效果产生的过程与机制进行实证考察。“魔弹论”的效果观逐渐受到否定。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是，社会调查法和心理实验法普遍应用于传播学研究，这个时期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三个：一是“传播流”研究；二是“说服性传播”^④ 的效果研究；三是“使用与满足”^⑤ 研究。

(3) 70年代以来的宏观效果理论。包括“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知沟”研究、“培养分析”以及“编码与释码”研究，等等。这些理论或假说的主题、内容各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

① 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② “传播流”（communication flow）指的是由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经过各种中间环节，“流”向传播对象的社会过程。构成这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拉拉斯菲尔德等人的《人民的选择》（1944年出版）、卡兹等人的《个人影响》（1955年出版）、罗杰斯的《创新与普及》（1962年出版）以及克拉帕的《大众传播效果》（1960年出版）。

③ 1960年J. T. 克拉帕在《大众传播效果》一书中对《人民的选择》和《个人影响》以来的“传播流”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了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五项一般定理”。即，1. 大众传播通常不是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的原因，它只不过是众多的中介因素之一，而且只有在各种中间环节的连锁关系中并且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发挥作用。2. 大众传播最明显的倾向不是引起受众态度的改变，而是对他们既有态度的强化，即使是在这种强化过程中大众传播也并不作为唯一的因素单独起作用。3. 大众传播对人们的态度改变产生效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其他中介因素不再起作用，二是其他中介因素本身也在促进人们态度的改变。4. 传播效果的产生、受到某些心理生理因素的制约。5. 传播效果的产生，还受到媒介本身的条件（信源的性质、内容的组织）以及舆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克拉帕的这些观点极力强调了大众传播影响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因而被称为“有限效果论”。参见 Klapper, Joseph T.,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Free Press, Glencoe, Illinois, 1960.

④ “说服性传播”的效果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指的是受传者的态度沿传播者说服意图的方向发生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纯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 C. I. 霍夫兰等人接受美国陆军部的委托，在军队里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实验，这是关于“说服与态度改变”的最早的实证研究。

⑤ “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的多样性，认为这种接触是个人根据自己的现实需求和心理需求，对传播内容进行能动选择的、有目的的行为。该理论在第四章有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一，它们研究的焦点大都集中于探索大众传播综合的、长期的和宏观的社会效果；第二，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传媒影响的有力性；第三，它们都与社会信息化的现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2. G·格伯纳的“培养理论”及其外围研究

1969年格伯纳在《走向义化“指数”：大众传播化的公众信息系统分析》中首先提出的假说。美国传播学家 M. 德弗勒指出，“大众媒体通过有选择地表现以及突出某种主题，在受者中造成一种印象”^①。因此，大众媒体可以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人们对人、事、物的态度和行动，这就是传播学中的培养理论。

“培养”理论，为了解决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格伯纳授权主持的“培养分析”就是在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的。

“培养分析”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出发点的。在格伯纳看来，新的范式“既不研究信息，也不直接研究影响，而是研究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在集体的语境中如何选择和解释信息”^②。它的基本观点，一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二是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三是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如暴力内容、对社会弱者的描述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一些学者也把它称为“美国土生土长的批判学派”^③。

“培养分析”并不是一项孤立的研究，相反，它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研究称为“文化指标研究”（Cultural Index Studies），起源于60年代后期，它有三个研究策略：“首先是体制过程分析（制度分析）；其次是信息系统分析（讯息系统分析）；最后是涵化分析

① [美] M. 德弗勒 等著，颜建军 等译：《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

② 常昌富等编选：《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③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培养分析)。最后一种策略也就是研究不同的电视观众被‘电视化’的程度。他们采用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方法来证明这个结论。研究发现,在看电视多少与对世界的不同看法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可能实际源于其他的变量”。^①“制度分析”、“讯息系统分析”和“培养分析”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1)“制度分析”。其主要目的是分析大众传播的信息生产、传达和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揭示大众传播内容的特定倾向性形成的原因。

(2)“讯息系统分析”(Message System Analysis)。大众传播的讯息是通过语言、文字、画面、影像等象征符号来传达的,这些讯息并不是符号的随意组合,而是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后的具有完整的意义结构的系统。讯息系统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媒介讯息系统的整体倾向性。这些倾向说明,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是按照一定的价值体系结构来安排的,讯息系统分析的出发点就在于揭示它的这一本质。

(3)“培养分析”是讯息系统分析的延伸,换句话说,它的目的是考察大众传播的特定倾向所造成的社会结果。格伯纳研究小组的结论来自长期实验的观察与对控制变量的分析,这就需要分析时精确的统计技术(诸如多元回归)和设计时更加谨慎的研究态度。

(二) 本文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本论文取跨学科研究视角,因此,文中论证分析将不仅仅局限于传媒领域本身。选取这样的视角乃是因为危机事件与危机传播是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表达。

在研究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目前有关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的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单一学科,单一视角的研究,如:公共管理研究者主要从政府视角研究;工商企业管理研究者主要从企业视角研究,使用的词汇是“危机沟通”(英文是同一个词 Crisis Communication);新闻传播研究者主要从新闻学和传播学视角研究,比如分析传媒的危机报道内容、调查公

^① [美] 赛佛林、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和作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众获取危机信息的渠道与媒体的危机报道效果、分析危机中流言的形成规律等。从学科划分看,危机传播在国内外都被划入公共关系学科的研究范畴。这些研究都很重要。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传播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分析影响危机传播信息流的主要方面,以期对危机状态下的社会系统进行更全面的观照。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促进国家应对危机事件的措施和系统更良性地运行。

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将使用以下几种方法: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对比归纳法。对比归纳法在本文中可称为“方法中的方法”,案例分析法与文献研究法将贯穿本论文写作的始末。虽然如此,这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这两种方法在全文的使用中会保持均等的比例。出于效用的考虑,它们在各个部分的使用中将有轻重之别。举例来说,文献研究法会特别突出地用于第一章中研究文献综述这一部分,当然此中也必然会包含归纳法。文本细读法和现场调研将重点用于第二章、第三章。其中的“文本”有双重含义,一为“纸本文本”,这与文献研究法中的“文献”等义;二为“电视作品”。理论整理和受众研究方法用于第四章,届时通过危机事件、媒体和政府在国家形象中的三方平衡关系模式得出突发事件与危机报道在政府应对方面与国家形象平衡互动理论范式分析及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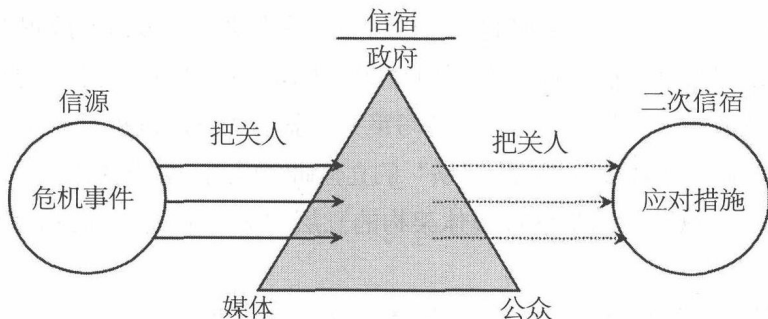
本论文对于研究理论的选择将遵循有机性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是理论与问题的有机关联,而不是单纯地为了理论而理论。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本论文在第二章第三节探讨传播效果理论与G·格伯纳的“培养理论”,这两个理论将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研究在危机事件的折射下应对策略所遵守的思考路径。

四、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一) 提出中心命题

假定俄罗斯某个时段、某个事件或某次传播的子系统为一个单独的抽象信息源,我们就可以将其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于是危机的传播过程就类似于普通物质形象的传播过程。所不同的是突发事件与危机传播的形成是国家系统发出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系统本身就十分复杂,系统之

中对于信息身份的认定不断发生变化，外部公众也处于不断变化中，相比单纯的物质形象的传播过程，要复杂得多。为了把如此复杂的问题清晰地表达出来，笔者首先在第一章提出文本的中心命题：突发事件与危机报道平衡互动因素范式研究。把国家应对的因素作了必要的界定。此范式以下面模型图来表示：



图绪-1 突发事件与应对措施平衡互动因素研究范式

上图说明，突发事件与危机报道是影响国家应对措施的关键环节。因为一旦危机爆发，政府、媒体和公众需要共同行动。危机报道只有在通过正确的传播渠道、被得到正确的传播、并被受众正确的理解后，做出正确的反应行为才能真正形成完全畅通无障碍的信息流，信息流的理想状态是国家应对传播效果最大化的体现，正如图平行的第二组虚线所示。柏拉图就曾把理想国比作“一个由处于动态平衡的相关部分组成的系统。在他所描述的理想社会里，社会结构的各类参与者完成各自的活动，从而对达到总体社会和谐做出贡献”^①。

然而，在现实中，信息流很难实现完全畅通无障碍。信息流在政府识别、媒体传播、受众信息接收与解读环节都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环节、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流障碍的制造者。所以，突发事件与危机报道平衡互动属于非常态，而危机报道与国家形象不平衡互动则属于常态。鉴于此，本文研究影响危机报道与国家形象平衡互动的因素成为可能和必然。

^① [美] 梅尔文·德弗勒等著，杜立平译：《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二）形成“三纵三横”的立体论述模式

为了弄明白从“突发事件”到“危机传播”再到“应对策略”的传播中有哪些因素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起着关键作用，就得先分析这一系列中介因素（N次信源与信宿）之间受到过哪些因素的影响，把它们放置在什么样的“研究液”中进行分析？如何论证本文的中心命题？又是如何架构本文的逻辑框架？在深入分析所掌握的大量材料后，笔者决定把该命题放置在极具“试验田”性质的俄罗斯大众传媒历经20年的转型阶段的广阔丰富的历史背景中，选取了该段背景中具有“特写镜头”张力的三次危机事件作为经典案例。至此，笔者形成“三纵三横”的立体研究模式，如下详谈。

1. “三纵”指的是本篇整体架构的三层“先论后述”递进式纵向分析。

“第一纵”是全篇的第一层结构，即第一章提出中心论点“突发事件与危机报道与国家形象平衡互动因素研究范式”后，第二章“危机报道与媒体应对”、第三章“危机报道与政府应对”和第四章“危机报道与受众应对”随之展开。这是一个先理论后实证的过程。

“第二纵”是本篇第二层结构，即在实证阶段每章的结构。沿袭的仍然是先理论后实证的模式，三章均为三节构成，第一节是理论提出和分析，后两节都是案例分析。例如在第二章“危机报道与媒体形象”中，第一节先阐述相关理论：“媒体形象理论概述”，后进行实证分析，如第二节“俄罗斯媒体形象分析”和第三节“俄罗斯危机传播效果分析”。

“第三纵”是每一节的论证中也采用“先论后述”的方式。

总之，“三纵”是根据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依照先论后述的逻辑进行的论证的依照方法，其优点有三：第一，条理清晰。第二，收放自如。第三，自成一体。

2. “三横”指的是三种体制、三次危机和三种形象应对策略分析的视角。多视点看同一个问题正是本文的研究意图。就俄罗斯大众传媒而言，其经历了三种政权的交替，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传媒观念，又经历了三次不同性质的危机事件，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媒体策略。例如，俄罗斯三种不同的媒体策略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以上视觉制约效果、价值形成与维护效果和社会行为示范效果可作为一种视角，以实证的眼光、以对

比的方法对俄罗斯三次危机报道所呈现的媒体策略进行分析和阐述。

“第一横”是指三种体制。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集权体制、俄罗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体制和普梅时期强势政府下的体制。

“第二横”是指三次危机。生产事故类的典型危机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战争类的典型危机事件－车臣战争和恐怖事件类的别斯兰人质劫持事件。

“第三横”指的是三种策略。由于危机事件的爆发，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所折射出来的政府策略、媒体策略和受众策略。

在本文的实证章节中，每一章节都有以上“三横”的对比研究。例如第二章第二节“俄罗斯四次危机事件报道中媒体策略分析”和第三节“俄罗斯三种传媒体制下的危机传播效果分析”；还有第三章第二节“俄罗斯三种政权模式下危机观念与政府策略的符号置换”和第三节“俄罗斯三种政权模式政府形象识别（GIS）程序”，都是在就同一个问题做多视角的横向对比。对比论证法堪称“方法中的方法”。该结构优点同样有三：第一，论证有力。第二，重点突出。第三，可圈可点。

（三）形成并阐述整体逻辑的框架图

通过以上“三纵三横”、纵横交错的立体搭建，本文的研究成果终于从一个平面“站了起来”，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有形的”“建筑体”。其整体逻辑的框架图如下：

综上所述，从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本文紧扣“危机报道与应对策略”主题，以俄罗斯转轨过程中传媒发展为基本主线，从“危机报道与媒体策略”、“危机报道与政府策略”、“危机报道与受众策略”的研究目标出发，深入探研转轨与传媒之间的互动机理，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对转轨国家的传媒力量、转轨过程中的传媒规制变化、宪政转轨与传媒变革对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诸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与比较，并系统分析这种差异存在的制度影响因素，从而在尊重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以传媒变革的视角更好地理解转轨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和策略。